

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顾志兴 / 著

Hangzhou Cang Shu Shi

杭州藏书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
杭州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杭州藏书史

顾志兴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杭州藏书史/顾志兴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004-9726-4

I. ①杭… II. ①顾… III. ①藏书—图书史—杭州市
IV. ①G25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6947 号

责任编辑 吴连生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316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指导委员会

主 任 辛 薇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其煌 史及伟 李志庭 何忠礼

陈 铭 林正秋 周 膺 唐龙尧

徐吉军 顾志兴 顾希佳 薛家柱

自序

在中国浩瀚的文化史上，我以为传统的藏书事业有着重要的地位。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必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如此，杭州亦然。

中国传统的藏书分为官府、私人、书院、佛寺道观四大体系，这并非自古以来就有如此明确的分工，而是在长期藏书实践中形成的，是藏书研究工作者总结历史经验加以揭示和概括提炼出来的。这同样也符合杭州的实际。

在四大藏书体系中，官府藏书（中央政府、皇家内廷和地方政府）是中国藏书史上最丰富，也是命运最悲惨的一种。原因很简单，说其丰富，可凭借官府和皇家的优厚条件，罗致全国典籍精华藏诸馆阁；说其悲惨，一旦改朝换代，往往毁于兵燹，灰飞烟灭。即或不遭战乱毁灭，其书亦深藏官禁不能发挥作用，此类事历史上在在皆是。故而史家论官府藏书称其“自来殿阁藏书又深闭宫门，宁饱蠹鱼，禁不供阅”、“中国历来内府藏书虽富而为帝王及蠹鱼所专有”，其余“公家藏书则寥落无闻”（吴晗《江苏藏书家史略·序言》），此语甚是。但作为历史现象还是值得研究。

杭州为南宋故都，在宋高宗重文化教育的影响下，国家秘书省藏书十分丰富，《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载：“高宗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这些藏书，反映了彼时文化上的建树，与南宋时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是相适应的。南宋宫廷内府藏书也十分丰富，帝王带头读书藏书，高宗有损斋藏书，理宗有缉熙殿藏书。理宗的缉熙殿藏书，知者较少，有关专著均未提及。我在撰著《浙江藏书史》及《南宋临安典籍文化》二书时，曾提出缉熙殿为南宋内廷理宗藏书殿堂，然因知之不多，故亦语焉不详。今撰著

《杭州藏书史》稽考典籍，潜心思索，知缉熙殿不仅为南宋宫廷一重要藏书处所，且有遗珍尚在人寰。远者如清官乾隆帝天禄琳琅藏书处曾入藏宋版《六经图》、《唐宋名贤历代确论》二书，皆钤有“内殿文玺”、“御府图书”、“缉熙殿书籍印”，均为朱文、白文煌煌大印，为缉熙殿旧日藏珍之确证。乾隆皇帝并有御题宋版《六经图》八韵诗，并钤“乾”、“隆”双玺印。于敏中《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评《六经图》为“若此本之古香宝刻，诚希珍也”。称《唐宋历代名贤确论》“字画刊印俱极工妙，信宋刻佳本也”。近者如我最近发现缉熙殿原藏之宋仁宗赵祯所撰《洪范政鉴》（重缮本）、《文苑英华》（周必大嘉泰年间吉州刊本），亦皆钤有上述缉熙殿三藏书印。今珍藏于国家图书馆。此两书被中国古籍保护中心按年代定为一级乙等，又因是缉熙殿故物，根据“不为时限原则”上靠为一级甲等。我据书上钤印大致考出宋元明清以来之传承关系，自诩这部《杭州藏书史》关于缉熙殿藏书的研究是中国宫廷藏书的一个突破。

杭州有幸，清乾隆帝编《四库全书》以江浙为人文渊薮，特在杭州建文澜阁以贮之。这对杭州的文化发展，人才培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围绕着后来的阁圯书毁，杭州人又上演了一幕精彩的故阁重建、三补库书、抗日战争时，护库书数千里的活生生的、激动人心的大剧。如今故阁依旧、库书无恙，体现了杭人保护文化、热爱书籍的人文精神。今日杭州西湖申报世界遗产，文澜阁被列为14处文化史迹之一，这真是锦上添花，意义不凡。

以地方官府藏书而论，清末时杭州有重大发展，即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杭州知府朱启凤顺应时代潮流，应社会贤达邵章、胡焕之请创办了杭州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官办公共藏书楼即杭州藏书楼。二十九年（1903）浙江学政张亨嘉与浙江巡抚聂缉槐商定，扩充杭州藏书楼为浙江藏书楼。宣统元年（1909）浙江巡抚增韫又奏请清廷批准将浙江藏书楼与浙江官书局归并扩充，创建浙江图书馆。民国元年（1912）正式开馆，自此传统的官府藏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成为与世界潮流相接轨的公共图书馆，这是传统官府藏书的一大进步和发展。

与官府藏书相比，杭州的私人藏书更显光辉灿烂。晋代，杭州已开私人藏书之风，至两宋兴起，明代繁荣，清代而鼎盛，其发展轨迹，脉络分明。以清代而论，乾隆皇帝编修《四库全书》，上谕点名征集杭州赵氏小山堂遗书。在编书过程中，全国私家藏书献书五六七百种以上为四家，杭州鲍氏知不足斋、汪氏开万楼，即占其半；其时进呈一百种以上至二三百种以上图书的私人藏书楼，全国共五家，杭州吴氏瓶花斋、孙氏寿松堂、汪氏振绮堂列名其中，五占其三，于此足见杭州私人藏书之实力和在社会影响之大。乾隆帝褒奖谕旨一颁，杭州私人藏书全国瞩目，人人称羨。至于杭州藏书家对中国文化之贡献，更足称者。如宋陈起之刊印唐诗与江湖诗集，前者使唐诗得以传播保存，陈氏有杰出贡献，王国维曾言“今日所

传明刊十行十八字本唐人专集、总集，大抵皆出陈宅书籍本也”。此为确然不移之定评。后者则保留了南宋一大诗歌流派江湖诗人的诗作，其功绩按《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南宋诗家姓氏不显者多，赖是书以传，其摭拾之功亦不可没也”；“宋季诗人姓名篇什湮没不彰者，一一复显于此日，亦谈艺之家见所未见者矣。”此言固是，然则从文化史的角度论之，陈起之功则远不止此。至若明藏书家洪楹之刊《六十家小说》（今称《清平山堂话本》）亦应作如是观。

清以前的官办学校，若府、州、县学之藏书，向列入官府藏书，然官学与书院均有讲学、祭祀、藏书三位一体之功能，其性质相似；尤其是杭州自元西湖书院以来，至明清万松书院（敷文书院）等，书院的官学化倾向十分明显，故以学校、书院藏书合载，似更符合实际情况，遂合并而述之。佛寺道观藏书为宗教藏书，历史上杭州有东南佛国之称，佛寺众多，其中高僧大德精研佛学，佛寺例有藏经阁之建以贮藏佛书经典。自宋以来，由于皇帝提倡，道教亦得到发展，其间，道藏所贮亦十分丰富，这同样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藏书史所不可或缺的内容。民国时期，学校书院合一，其藏书性质纯为教学参考和供学子课外阅读，与旧时有所不同；佛寺道观藏书则与前代无多大变化，故在本书中以上两者略而不述，以省篇幅。

我撰著这部《杭州藏书史》主观上有个目的，是想为杭州这个藏书之乡做个小结，留下一点史料。有朋友曾说何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一并述之？一者为篇幅所限，二者时代不同，藏书形式亦有变化，如今一部手提电脑装一部卷帙浩瀚的《四库全书》绰绰有余，又有电子书、电纸书等，岂三言两语所能说清？老夫老矣，此等新事物只有俟后日高贤论之。

研究历史，一为总结过去，鉴古知今；二为现实，吸收经验教训，为未来服务。人类总是在继承中前进，在前进中发展。就藏书而论，同样如此，总结过去，是为未来的发展，我以为其中亦经验教训多多。

清末所创的官办杭州藏书楼，发展为浙江藏书楼，到民国时的公共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是传统官府藏书的一大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图书馆事业得到重大发展。即以杭州的浙江图书馆而论，因其历史悠久，藏书甚富，如今新馆舍的建造，在全国而言，亦是一座有重大影响的图书馆。再以杭州图书馆而言，该馆创建于1958年，年仅知天命而不足一甲子，收藏以杭州地方文献为其特色。其馆舍及内部设施，已跨入国内先进行列，有些已达国际先进水平，期以时日，藏书日益丰富，其影响将日益彰显。此外，杭州市各县以及城区各区级公共图书馆同样得到发展，其规模、藏书是旧日所无法想象的。此无他，皆因中国共产党及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视所致也。

学校藏书和旧日相比亦有重大变化。自民国年间起学校藏书已和官府藏书相脱离。就藏书的内容而言，一些办学年久的高校除贮藏传统的线装经史子集外，藏书多为服务于教学和科研活动，除大宗为中文典籍外，外文图书亦占很大比例，其收藏量之巨、内容之丰富多彩，亦非旧日所能比拟，这亦为时代进步所致。

随着乾隆版佛典《大藏经》和明代《道藏》、《续道藏》的重印，今日普通寺观收藏上述之浩瀚巨帙并非罕见，这在旧日同样无法想象。加之如杭州灵隐寺重建藏经阁、高丽寺之重建转轮藏，既保持传统佛寺藏书特色，又有新的拓展，引人注目。

传统的四大藏书体系中，我认为最值得研究的是私人藏书。家庭是社会组成的细胞，私人藏书往往关乎一个家族和人才的兴衰，杭州有藏书之乡的美誉，其原因也在于此。两宋以来，杭州私人藏书在不断拓展，从士大夫、官宦世家到文人学者藏书，明清时扩展到商人，以至平民百姓，山乡水村也有所谓“耕读世家”、“诗书传家”的，家庭藏书，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是杭州藏书事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举个例子，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塘栖镇，兴起于明代，然至明之中后期及到清代，一个市镇就出现吕氏樾馆、卓氏传经堂、劳氏丹铅精舍、朱氏结庐等国内知名的藏书楼，这反映了杭州私人藏书事业繁荣。镇犹如此，遑论仁和、钱塘两县。

风光的私人藏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却反见萎缩，其原因人所共知。静而思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政治运动中，矛头所指，几乎无不指向知识分子，指向书籍，举例而言，诸如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一直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20世纪60年代初，一部尚未正式出版的《刘志丹》，成了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的一大“发明”，打了一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连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也未能幸免，被撤职并受到错误批判。而他只是对小说提了些修改意见，希望写出陕北根据地的创建过程（马立诚：《刘索拉送我〈刘志丹〉》，《南方周末》2010年5月27日第23版）。如此种种以书为敌，至“文化大革命”而发展到极致，神州大地矛头针对书籍，“自觉”、被迫烧书者众。那时，有些人家素向有些藏书的，无不付之一炬。书，成了革命对象。还有的运动，尽管与书、与知识分子表面看来无关，但剑走偏锋，歪招迭出，书同样不能逃脱厄运。例如“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书亦遭株连。记得1965年下半年，我到某县参加社教运动。见一旧厢房（三四十平方米），满满当当堆的全是发黄的线装书。当时颇不解，就问工作队长是怎么回事？队长告知，这些“黄色书”，都是运动中下面收缴上来的，过些日子有空，将它烧掉。我与这位队长私人关系不错，很想救这批书，先是陈说所谓“黄色书”的内涵；后是引领袖的话，文化有精华、糟粕之分。此话队长是听进去了，说下次请人鉴定整理后定。然而不

久，“文化大革命”狂潮涌动，这批书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了。

在如此的政治氛围下，读书有罪，何论藏书？噩梦过去，杭州人仍爱读书、藏书，犹记1980年代初，有消息说书店将出售一批重印之古籍，若四大名著、唐诗宋词之类。据说城区各新华书店漏夜有读者排队，队伍延及百米之遥。次日开门，书籍抢购一空，其盛况远超购买紧俏日用品，使书店风光一阵。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提倡读书、藏书，杭州曾举办过几届十大书香人家的评选，敝人有幸，躬逢盛会，有幸首届忝列其中；也有人撰文具体建议举办读书日的，读书节的；等等。长此以往，定有实效，提倡读书藏书终是好事。新的时代，私人藏书有新的内容，新的发展。故而期待假以时日，重续杭州私人藏书香火会当有期，以光我杭州文化名城和藏书之乡的雅称。

末了，我还想说一句话，藏书为了读书，读书是第一位的；藏书在于积累，读书求知识也是这样。如庄周老夫子在《逍遥游》中所言：“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此为我之读书藏书观。

顾志兴

2010年5月16日

于杭州孔庙之北寓所

孤桐凤竹野柿书舍

目 录

第一章 官府藏书	1
第一节 南宋辉煌的宫廷和国家藏书	1
一 内廷诸阁	2
二 御书院	3
三 损斋	3
四 缉熙殿	3
五 德寿宫及左廊司局等宫廷服务机构	12
六 秘书省	12
七 国子监	15
第二节 清代皇家藏书楼——文澜阁	16
一 乾隆皇帝下诏建阁藏书	16
二 四库编纂 浙人功巨	18
三 咸丰兵祸 阁圯书散	20
四 故阁重建 三补得全	20
五 抗战爆发 书迁西南	22
第三节 浙江书局的创办对官私藏书起到的重要作用	22
一 浙江官书局在杭州的创建	22
二 浙江官书局刊印的典籍	23
第四节 杭州(浙江)藏书楼和浙江图书馆的创建	25
一 杭州藏书楼	25
二 杭州藏书楼扩充为浙江藏书楼	25
三 浙江图书馆的建立	27
第五节 民国时期杭州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和日军侵华时期的毁损	28

一 浙江图书馆	28
二 杭州市及所属县区公共图书馆	31
第二章 源远流长的私人藏书	33
第一节 唐末五代以前私人藏书	33
一 晋代钱唐范平、褚陶等的藏书活动	33
二 五代时钱氏家族藏书	34
第二节 两宋时期私人藏书事业的兴起	35
一 经济发达,印刷业繁盛,奠定藏书物质基础	35
二 私人藏书家、藏书楼	38
第三节 元代私人藏书事业的缓慢发展	49
一 杭州官私藏书有损失,但“书种”不断	49
二 私人藏书家、藏书楼	50
第四节 明代私人藏书事业的繁荣	53
一 文教和印刷业的发展促进藏书事业繁荣	53
二 私人藏书家、藏书楼	57
第五节 清代私人藏书事业的鼎盛	68
一 清代私人藏书鼎盛的原因	68
二 私人藏书家、藏书楼	72
三 附:海宁私人藏书家、藏书楼	105
第六节 民国时期传统私人藏书的余晖	129
一 私人藏书文化背景	132
二 私人藏书家、藏书楼	135
三 附:海宁主要藏书家、藏书楼	178
第三章 学校与书院藏书	183
第一节 宋代学校书院藏书	183
一 学校藏书	184
二 书院藏书	189
第二节 元代书院藏书	190
第三节 明代学校书院藏书	193
一 学校藏书	193
二 书院藏书	196
第四节 清代学校书院藏书	198
一 学校藏书	198
二 书院藏书	200

第四章 佛寺道观藏书	203
第一节 五代时期佛寺道观藏书的开端	203
一 佛寺藏书	203
二 道观藏书	205
第二节 两宋时期佛寺道观藏书兴起	205
一 佛寺藏书	205
二 道观藏书	207
第三节 元代佛寺藏书的继续	209
第四节 明代佛寺道观藏书的普及	210
一 佛寺藏书	211
二 道观藏书	215
第五节 清代佛寺道观藏书的繁盛	216
一 佛寺藏书	216
二 道观藏书	225
 第五章 总论杭州私人藏书特点及杭州藏书家对 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	 227
第一节 私人藏书特点	227
一 士大夫藏书成为主流,藏书世家辈出	227
二 刻印抄校并重,增益藏书,提升藏书质量	228
三 藏书供学术研究,多学者型藏书家	230
四 重收藏宋元旧本、精本	231
五 关注地方文献和其他专题典籍收藏	232
第二节 杭州藏书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	234
一 陈起、陈思保存传播唐诗、宋诗	234
二 洪楗保存传播宋、元、明三代白话小说	236
三 丁申、丁丙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	237
 后 记	 239

第一章 官府藏书

中国自有藏书事业，官府藏书为重要内容。南宋建都杭州，皇家内府、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皆例有藏书。正如吴晗在《江苏藏书家史略》序言中所说“自来殿阁藏书，又深闳宫门，宁饱蠹鱼，禁不供阅”、“中国历来内府藏书虽富而为帝王及蠹鱼所专有”，其余“公家藏书则复寥落无闻”，到了清代杭州又有江南三阁之一的文澜阁皇家藏书，至今岿然尚存，影响深远，是杭州藏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现据文献，剔抉爬梳，分而论之；地方政府藏收无大的特色，则略而不述。

第一节 南宋辉煌的宫廷和国家藏书

南宋绍兴八年（1138）高宗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称行在所，示不忘汴都之意。靖康元年（1126）三四月间，金人先后掳徽钦二帝及后妃诸王以及官吏工匠倡优等数千人，同时将北宋立国以来所蓄积文物宝藏图书劫掠一空，辇载而去，就图书而论，毁损十分严重，有史为证：

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翰林学士张观等编四库书，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书有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徽宗时更《崇文总目》之号为《秘书总目》，诏购求士民藏书。其有所秘而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仍命以官。……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辑，至是为盛矣。……尝历考之，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三千三百二十七部、三万九千一百四十二卷。次仁、英两朝一千四百七十二部、八千四百四十六卷。次神、哲、徽、钦四朝一千九百六部、二万六千二百八十九卷。三朝所录则二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

于两朝亦然。最其当时之目，有部六千七百有五，有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1]。

简而言之，北宋馆阁之藏，自宋初起所积贮藏书，至“靖康之难”时已全数毁于战乱。至于南宋一朝馆阁藏书，则全为建都杭州后重新征集、购置而渐复旧观的。《宋史·艺文志》卷二〇二又云：

高宗移辟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当时类次书目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宁宗时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视《崇文总目》又有加焉。

一 内廷诸阁

自北宋建国后，皇宫内设有专门保存、收藏皇帝御笔御札及供皇帝阅读使用图书的场所，有太清楼、翰林御书院及龙图阁等。宋室南渡，建都杭州，政局稍加稳定以后，高宗重视文教，在绍兴二十四年（1154）于宫内复建存放祖宗御制御集的诸阁，此后，南宋诸帝逝世后，继位皇帝又复建阁藏前朝皇帝御制御集，其情况为：

（一）复建北宋诸阁

龙图阁始建于咸平年间（998—1003），复建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此阁贮藏太宗御制御集及四部书。

天章阁始建于天禧四年（1020），复建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此阁贮藏真宗御制御集。

宝文阁始建于嘉祐八年（1063），复建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此阁贮藏仁宗御集，后附英宗御制御集。

显谟阁始建于元符元年（1098），复建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此阁贮藏神宗御制御集。

徽猷阁始建于大观二年（1108），复建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此阁贮藏哲宗御制御集。

据《咸淳临安志》卷二《宫阙二·祖宗诸阁》载，尚有“太祖皇帝”，未列阁名，复建时间亦未载。

（二）南宋新建诸阁

敷文阁 绍兴十年（1140）建。此阁贮藏徽宗御制御集。

焕章阁 淳熙十五年（1188）建。此阁贮藏高宗御制御集。

华文阁 庆元二年（1196）建。此阁贮藏孝宗御制御集。

宝谟阁 嘉泰二年（1202）建。此阁贮藏光宗御制御集。

宝章阁 宝庆二年（1226）建。此阁贮藏宁宗御制御集。

显文阁 咸淳元年（1265）建。此阁贮藏理宗御制御集。

以上建阁时间等，见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二，有关建阁诏书从略不录。

二 御书院

北宋太宗朝起，在宫内设有御书院，收藏图书、法帖等。绍兴十六年（1146），高宗复置御书院，藏书具体情况不详。

三 损斋

损斋为南宋宫廷中一书斋。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称：此斋为宋高宗（见图1）亲自命人建造并命名，建于绍兴末期。宋高宗颇好学，喜读书。早年尝谓辅臣曰：“朕居宫中，自有日课：早阅章疏，午后读《春秋》、《史记》，夜读《尚书》，率以二鼓罢，尤好左氏《春秋》，每二十四日而读一过。”后胡康侯进《春秋解》，高宗置之座侧，极其珍爱。又悉书六经，刻石置首善阁下。建损斋时，高宗已进入老年，因自作《记》，刻石以赐近臣。损斋内贮经史古书其中，摒去一切玩好之物，为高宗晚年读书、藏书之所。



图1 宋高宗画像

四 缉熙殿

缉熙殿是理宗与臣子研究理学与藏书、读书的殿堂。

宋理宗赵昀（1205—1264）[见图2]，初名与莒，宋太祖赵匡胤十世孙。嘉定十七年（1224）宁宗死，被丞相史弥远矫诏立为帝。绍定六年（1233）弥远死后，亲政，在位四十年，其间任用贾似道，朝政日坏，又崇信理学，表章《四书》，确立理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缉熙殿建于绍定六年（1233），是年理宗亲政。关于缉熙殿，《宋史》及宋人笔记、《咸淳临安志》皆有所记，清人朱彭《南宋故迹考》亦有考证。

《宋史》卷四一《理宗纪》：绍定六年九月辛酉“经筵官请以御制敬天、法祖、事亲、齐家四十八条及缉熙殿榜、殿纪宣付史馆”。

《西湖老人繁胜录》：“诸殿属”下有缉熙殿。

吴自牧《梦粱录》卷八“大内·禁庭诸殿更有者十”，缉熙殿名列其中。

周密《武林旧事》卷四：“故都宫殿·后殿”有殿二十五，有“缉熙”，下有注：“理宗建。”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缉熙殿，理宗皇帝辟旧庐为之。”并收录理宗《缉熙殿记》全文，中有言曰：

朕以凉薄，绍休令绪，通遵成慕，祇迪懿训，罔敢暇逸师式于前闻。视朝之隙，临经幄日再款对群臣，商略经史。乃即讲殿辟旧庐，采成王日就月将之意，匾以“缉熙”。屏去长物，哀置编简，燕闲怡愉，藏修移日，习熟滋久，若常程然。



图2 宋理宗画像

王应麟《玉海》卷一六〇《绍定缉熙殿》条称：“绍定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御制敬天命、法祖宗、事亲、齐家而下凡四十八条，诏讲读说书官撰箴辞。明年六月甲午，缉熙成，御书‘缉熙’二字榜之，亲为记文，以所制箴辞，亲洒宸翰列殿上备览观。便殿名‘膺福’。”

有关缉熙殿的建造经过等，清朱彭《南宋故迹考》卷上《内朝后殿·缉熙殿》有所考证，然所据多为上述王应麟《玉海》所言，故不录。

从以上有关引文，可以看出缉熙殿乃宋理宗与群臣“商略经史”、“哀置编简”之所，藏书是缉熙殿的主要功能之一。

缉熙殿为了藏书，专门设置了为之搜集购置典籍的官员。南宋杭州藏书家、书商陈思曾任此职。据《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六《宝刻丛编》提要称：“宋陈思撰，思，临安人。所著《小字录》前有结衔称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于此可证陈思曾任缉熙殿搜书访书的职务，国史实录院、秘书省也是大量需要书籍的政府机构。据考，陈思生活年代正在理宗时期。

我研究浙江和杭州的藏书史多年，近年判定缉熙殿是理宗的藏书处，始分别写入《浙江藏书史》（2008年版）和《南宋临安典籍文化》两书。缉熙殿未有书目传世，只是在《天禄琳琅书目》卷一中查到清大内乾隆皇帝的“天禄琳琅”藏书处曾入藏过缉熙殿的旧藏《六经图》和《唐宋名贤历代确论》两部宋版书，然“天禄琳琅”藏书处于清嘉庆二年

(1797) 遭火,后重新搜集为“天禄琳琅续藏”,但在彭元瑞撰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已找不到这两部书,估计已不在人寰,深为可惜。近日,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得知当年缉熙殿旧藏尚有《洪范政鉴》、《文苑英华》两书尚保存在国家图书馆。遂检有关史籍,前人笔记、藏书记等考其传承和得以保存原因。

(一)《洪范政鉴》十二卷,宋仁宗赵祯撰

此书为赵祯撰于康定元年(1040),北宋国灭,无迹可寻。南宋建炎三年(1129),高宗因这部书是祖宗和先皇所著,故而特别重视,曾下诏访求无着。及至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访到稿本,遂“令秘阁缮《洪范政鉴》一本进纳”。前后经历了五十八年。这部淳熙重缮本,后收藏于理宗缉熙殿,今藏于国家图书馆。根据文化部颁发的《古籍定级标准》有关规定,定为一级甲等的古籍为“北宋及北宋以前(包括辽、西夏时期)刻印抄写的古籍”。《洪范政鉴》是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内府写本,故定为“一级古籍乙等”,但鉴于“此本内有‘内殿文玺’、‘御府图书’、缉熙殿书籍印等印,原系宋代官藏之物。宋代宫廷写本传世极罕,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价值及版本价值。……定为一级乙等;又根据……不为时限原则,上靠为一级甲等”^[1]。

此书清末民初大藏书家傅增湘曾入藏,叙其版式甚详:全书十二卷,每卷分上下,凡为子卷二十四,朱丝栏,左右细线,无边栏,半叶九行,每行十七字。避宋讳至慎字,敦字不缺笔,审为孝宗时重缮本。桑皮玉版,厚如梵夹,蝶装旧式,凡十二册。

(二)《文苑英华》一千卷,宋李昉等编,为北宋编纂的四部大书之一(余为《册府元龟》、《太平御笔》、《太平广记》)

目前存世的仅十五册一百五十卷。国家图书馆藏十三册,为二百三十一卷至二百四十卷、二百五十一卷至二百六十卷、二百九十一卷至三百卷、六百一十卷至七百卷。此书亦为南宋理宗缉熙殿旧藏。书上钤有“内殿文玺”、“御府图书”、“缉熙殿书籍印”等印。“宋刻宋印,开本宏朗,流传至罕。……书为蝴蝶装,封里有‘景定元年十月,装褙臣王润照管讫’一行字样。其重要价值在于保留了宋代原装,书上有装褙臣的姓名仅此一见。”^[2]此书据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古籍定级参考图例(试用本)》定为一级古籍乙等,又根据“不为时限原则”,“上靠为一级甲等”^[3]。

傅增湘于己巳(民国18年,1929年)寓目二百三十一卷至二百四十卷(十卷一册),有记曰:“宋刊本,十三行二十二字,注双行同,白口双栏,版心上计字数,下记刊工姓名……宋讳避至廓字止。”每卷后标题后空一行书“登仕郎胡柯、乡贡进士彭叔夏校字”衔名,钤有“内殿文玺”、“御府图书”、“缉熙殿书籍印”,均南宋内府钤印。附叶有墨书木记

^[1] 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古籍定级参考图例(试用本)》,第13页。

^[2]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中华典籍聚珍》,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3] 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古籍定级参考图例(试用本)》,第9页。